

影戏人长安

早期西安电影放映与都市文化（1910—1949）

原文泰 孙晓京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影戏入长安:早期西安电影放映与都市文化:1910—1949/原文泰,孙晓京著.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2020.12
ISBN 978-7-309-14935-7

I. ①影… II. ①原… ②孙… III. ①电影史-研究-西安-1910-1949 IV. ①J9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20)第185989号

影戏入长安:早期西安电影放映与都市文化:1910—1949
YINGXI RU CHANG'AN: ZAOQI XPAN DIANYING FANGYING YU DUSHI WENHUA
(1910—1949)
原文泰 孙晓京 著
责任编辑/朱安奇

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上海市国权路579号 邮编:200433
网址: 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门市零售:86-21-65102580 团体订购:86-21-65104505
外埠邮购:86-21-65642846 出版部电话:86-21-65642845
江苏凤凰数码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6 字数145千
2020年1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ISBN 978-7-309-14935-7/J·443
定价:36.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一

《影戏入长安：早期西安电影放映与都市文化(1910—1949)》是原文泰谋求学术转型的初步成果。数年前，他在上海读博期间，主要研究的课题是从电影叙事角度观察上海都市的“拥挤经验”，即因人口过度膨胀导致的居住空间逼仄，租客与房东的紧张关系，及其背后的都市化无序发展，人们关于都市现代性的负面经验等。但是，他毕业以后离开了上海，入职西安某一高校任教。这样一来，想要持续开展对上海城市文化的相关研究，就会面临学术资源断供的危险。这种情况下，就不得不考虑对学术趣味和研究重心进行重新调整。

刚好他后面几届的学弟学妹，博士论文选题大都集中在地方性电影文化历史方面，分别锁定了抗战时期山西地方自治与电影文化的传播与消费，胶东地区电影文化的兴起与殖民现代性的关系，以及作为民国首都的南京，其影院发展与商业文化系统的建构等。顺着这个思路，原文泰提出能否以“西安早期电影放映与都市文化关系”作为未来新一轮的研究选题。对此，我的态度当然是给予充分的肯定和鼓励，因为这类题目本身正是我与学生们近年来讨论最多的领域之一。

传统电影史述，似乎是有意无意忽略了中国电影文化与历史

文脉的地域性差异问题。首先，人们的研究视野大多集中在上海、香港、北京等几个中心城市，而难以勾画出一个关于“中国”的完整文化地图。这种现象不能不说是受到某种特定史观的局限，好比与电影发展密切相关的现代化问题。近代以来，传统中国在西方坚船利炮催逼下被迫向世界敞开国门，使西风东渐成为中国现代化的一种肇始方式，在地理上呈现为由东向西、由南向北梯次展开和演进的运动轨迹。这既与中国的自然地理环境有关，又与中央政府和各地方政府在面对现代化时所持的态度、方略、路径脱不了干系。如果说电影的传入、传播与落地生根代表着一种现代化在中国渐次展开的可见方式，那么，对它的讨论就注定离不开一个以时间为纵轴，以地域为横轴的时空坐标系统。好比香港、上海等口岸城市最早的电影放映都出现在 19 世纪末，而某些中西部城市却一直要到 20 世纪 30 年代才真正开始。对于这种时空坐标上的错位和间距，传统电影史显然缺乏必要的关注和反思。某种程度上，这很容易让人忽略“中国”的内部差异性、复杂性，而陷入一种关于“中国”的刻板化、整一化论述。

从开放的、现代化的都市文化形态上看，上海似乎很难被视为一个典型的中国城市，不少学者更愿意将其放置在一种世界主义的理论范式中，从跨地性与在地性的张力关系中，展开对上海城市文化个性的理解和阐释。电影的发明问世、跨地传播，更是天然地带有一种跨国流动的世界主义属性。至少在有声片问世以前，以影像而非语言为主要叙事载体的电影，在文化上并不具有显著的民族国家特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耶鲁大学的著名学者达德利·安德鲁教授于不久前提出一种对世界电影史的重新分期，认为电影在 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 20 年代有声片问世之前，是处在一个被他称为“世界主义阶段”（cosmopolitan phase）的特殊历史时期。对于中国学者而言，这一观点值得被格外重视和反思，原因就

在于它能让我们摆脱从单一民族国家角度来定义、研判电影文化在特定地区的发生机制,从而对香港、上海、哈尔滨、青岛等这些带有明显殖民地、半殖民地属性地区的早期电影放映状况进行重新审视和解读。倘若以此作为一种电影文化兴起的历史参照,你会发现西安电影的发展轨迹呈现出的一种与上述各口岸城市截然不同的文化逻辑。在我们看来,这种努力更有利于突显“中国”问题的复杂性和内部差异性,因而是一种值得肯定和鼓励的学术方向。

其次,原文泰的这一研究,脱离了传统电影史以文本分析评价为主轴的老旧写作框架,将电影史与更为广泛的社会生活史混搭在一起,从而形成了一种趋向社会文化综合史的历史写作趣味。这也是近年来我们一直在努力尝试的一种电影史述体例的创新。原文泰的博士同班同学、福建师范大学副教授侯凯已于今年早些时候出版了他的博士论文《上海早期影迷文化史(1897—1937)》(中国电影出版社2020年版),书中对上海影迷文化的发轫、发展,从城市区域划分、交通物流、人文风貌、市民的衣食住行、人际交往以及区域性消费力量(如虹口地区)的形成等方面进行了详细爬梳,以此来凸显电影消费在上海都市文化形塑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巧的是,原文泰在他的研究中也实践这种日常生活史的写作笔法,比如书中有一章也详细讨论了西安影迷的形成过程,从“吃牛肉”“吃馄饨”到走进影戏院,从模仿明星、追慕银幕时尚的青年男女,到“摩登女郎”引发传统还是现代的舆论争执等。这些描写显然不太符合以文本评价为中心的正统电影史写作范式,似乎更接近一种稗史、野史的写作趣味,但它的好处在于,能为读者勾勒出西安影迷文化与市井生活有别于上海的“乡土气息”,从一个特定角度渲染了西安电影文化的在地气质。

在本书中有一节叫作“‘东’学‘西’用”。这里带引号的“东”和

“西”指的不是世界版图意义上的“东方”或“西方”，而是中国内部的东部沿海与西部内陆，以此聚焦我前面强调的中国现代化由东向西呈阶梯式分布的地理特征。作者以此带入中国内部的“东”“西”关系问题，从影院建设、影片来源、电影宣发商业系统的建构等几个方面论述了西安电影与上海电影的文化关联性。这也是一个十分有趣的话题。早些年，内地一些青年学子开始着手地方性电影文化研究的初衷，或多或少都是为了回应由叶月瑜教授等一些港台地区或海外学者提出的“走出上海”的学术动议。但是，走出上海不等于脱离上海，不论在胶州半岛、山西腹地、西南边陲，还是在本书所涉的西安城厢，虽然它们都在各自努力塑造一种属于本乡本土的在地性论述，不过很显然，上海电影的辐射力、影响力却又如影随形，无所不在。无形中似乎浮现出某种带有辩证性的文化关联，一方面是写作初衷上诉求“走出上海”，另一方面在电影的文化渊源上又不得不“回归上海”。这样一种带有思辨张力的论述，在我看来恰恰是内地学子对于“走出上海”议题的一种深度思考的结果。

最后我想强调的是，对西安早期电影放映的研究并不是一个可以轻松展开的题目，它必须建立在对地方性史料、档案长期“考古挖掘”和有效积累的基础之上。当初原文泰向我提出这一课题的时候，我最担心的问题也就是他如何才能在短时间内对海量的地方性文献、档案、史料进行相对比较充分、扎实的挖掘、搜集、分析和研读，并能从中归纳、提炼出相应的史学观点。我本人对西安城市文化史是个彻头彻尾的门外汉，无法预料他在自己的研究写作过程中会碰到什么样的阻力和难题。所以我对他说，写这个题目基本上等于花费三四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再读一个博士学位，而在这个过程中，我作为导师无法为你提供任何有效的帮助，所有一切，只能靠你自己。当初我说的这话，言犹在耳，时间却一晃过了

四年。如今书稿出来了,我才些许安心。从他小心翼翼处理各类文献史料,行诸文字的情形看,这一关他是不是算过了呢?总之,多说无益,还是留待读者和学界同侪作出客观公正的评价吧。

是为序。

石 川

2020年11月7日于上海

序 二

110年前,西安便已经开始了电影放映活动。随着1930年第一家正规电影院开业,西安先后建立起十余家专门的电影放映场所,早期西安电影围绕电影放映、电影广告、电影批评、电影传播与辐射等,形成了特殊的西安电影生态。然而,对于陕西的早期电影史研究而言,仍存在许多尚待填补的空白领域。《影戏入长安:早期西安电影放映与都市文化(1910—1949)》一书,则恰好是对西安早期电影史研究的积极探索,有助于拓展西安本土电影研究的体系,同时也是对多元中国电影史书写的有益补充,更是中国电影地缘文化发展研究的一个鲜活案例。

作者从区域社会史视角出发,审视了1910—1949年不同历史时期电影在西安的发展轨迹。通过对大量西安电影资料的梳理,勾勒出电影在西安不同时期的文化样貌,探讨了电影在本土社会、文化、思想观念影响下的在地化过程。

书中用翔实的原始史料、丰富的报纸杂志文字来重现西安的电影文化版图。作者在西安电影放映的特征方面给予了详尽的梳理,结合各类史料,对西安最著名的电影院——阿房宫大戏院及周伯勋、于孝先等重要影人展开个案研究,重点关注了电影这一新兴媒介初入陕西时对西安城市的影响和改变。特别是对20世纪三

四十年代《西北文化日报》《西京日报》《新陕西月刊》等报刊上市民日常生活中的诸多具体、鲜活的细节进行引用和分析，十分生动有趣。面对庞杂的史料、档案，作者细心梳理，为学术写作做好了准备工作。通过对丰富的历史细节的捕捉与分析，充分将电影同本土化特征相结合，阐释了电影对西安人生活方式、物质消费等层面的影响。同时以小见大，深入探讨了西安现代意识的萌生和传统到现代的嬗变。

本书另一大特色之处，在于作者使用“历史地理学”的方法，以空间作为观察视野，分析了电影放映场所的变迁和影院建筑对都市地景的影响。比如第二章第二节，作者对电影院分布密集区域的地理位置、经济、交通、人口分布等多方面因素展开考察，更加立体地论述了电影院从早期聚集的南院门地区向东大街一带迁移的过程及原因，分析了电影如何逐步渗入西安城市腹地，如何与都市文化空间建立起更为紧密的联结。这种跨文化研究的方法，不再仅仅将电影当作孤立的艺术形式，而是将其看作反映社会、经济、政治的媒介，电影文化生态的全貌得到更丰富的呈现。

诚然，1949年前的西安并非电影制作中心，电影放映也因为设备、片源等问题存在严重的发展障碍。但正如本书中向读者呈现的——电影在融入本土文化语境的过程中，一方面在向西安人彰显电影独特的现代性气质，另一方面与当地的都市地景、消费文化发生碰撞，使之成为特殊的案例，值得被追溯、讨论。我希望将这样一本书推荐给想要了解西安电影传播与发展史，和对老西安充满好奇与想象的读者；也希望通过此书，激发更多学者一同来探索这座历史古都。

张阿利

西北大学教授，陕西省电影家协会主席

前言

围绕重写电影史的理论背景,中国电影史当下的研究已经进入了从史料发掘、研究范式、研究思路等方面进行革新的时代,研究视野也从通史、发展史等既有的传统框架中跳脱出来,开始在电影的跨文化研究、区域电影文化史、明星生活史等多个研究维度进行新颖的尝试。此外,区域电影史是当下史学研究中的热点,也是史学研究发展的必然趋势。一方面,区域史是有别于宏大国族叙事的微观、局部地方群体的“小历史”等维度的研究方向;另一方面,区域电影史这种着眼微观的研究视角使研究者加强了对以往利用较少的各类史料的关注,如日记、感想、游记等个体化色彩较强的资料,也有助于研究本身的深入。

诚然,1949年前的陕西并非电影制作中心,且从地理位置来看,与当时的电影生产之都上海相隔遥远,再加上经济、人口、交通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地处内陆的陕西电影制作基本是无从提起,而电影放映也因为设备、片源等问题存在严重的发展障碍。早在1928年,一篇名为《内地开设电影院之困难》的文章便对内陆地区电影放映面临的问题作了陈述。然而,伴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作用以及电影人艰难的摸索,西安电影自1910年起步,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形成了一个相对完整且特殊的电影文化生态。在

1910—1949年巨大的时间跨度中，掩埋着厚重的关于西安电影文化传播的历史细节，这些内容值得被发现、被重提。

本书共分为五章。第一章“于迷茫中摸索：早期西安电影放映”将目光投射至电影在西安首次出现的时间，对早期不成规模的零散放映进行梳理，并将早期电影现象置于社会总体史的背景下加以分析。第二章“观影空间转向：西安专门影院的建设”回顾了20世纪30年代初西安第一家电影院的开业，至此，西安电影放映结束了依附于其他空间的历史，开设了专门的电影院。这一部分对电影院的建立与变迁进行了整体性论述，重点对电影院的分布特点进行规律性总结，对影院供片方式、票价设置、影院宣传等议题展开讨论。同时将阿房宫大戏院作为个案，从影院建设、影片排映等方面呈现西安电影从业者探索影院经营之道的艰难历程。第三章“复杂场域：西安的电影消费文化”将重点从电影院转向更为复杂的日常生活空间。随着西安电影氛围的日益浓厚，纸媒关于电影的讨论也热烈起来。以民国时期西安重点报刊中的电影话语空间为主要研究对象，在史料的解读中阐述西安的电影消费文化境况。其中，由于抗战时期的陕西担任着特殊的历史角色，因此，战时电影文化现象将作为单独的一节予以呈现，考察多元交织的文化场域中电影放映机制、电影文化建设等内容。第四章“摩登之隙：西安早期影迷文化的生成”用“社会生活史”的研究方式，把电影看作市民日常生活和都市文化空间的有机组成部分，探讨西安影迷的生成、电影消费以及与迷影现象密不可分的明星文化在西安的在地化特色。此外，由于电影对西安市民的生活、消费习惯产生了巨大影响，引发了不少关于“传统”与“现代”的争论。从更高的层面而言，西安官方从电影审查、政策管控等方面实施了诸多办法，以抑制过度的公共消费行为。这些作为本章的重点内容，还原了最为真实的西安影迷文化氛围。第五章“领风气之先：民国

时期重要的西安电影人”属于个案研究,专门论述了对西安早期电影文化发展具有重要作用的电影人:阿房宫大戏院的重要推手——周伯勋,民光大戏院的创办人——于孝先,以及如左明、王瑞麟、郑伯奇等陕西籍电影人,重点论述他们对西安电影发展作出的努力和贡献。

在本书最后,附有西安电影发展大事记、20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的物价变化等资料,以及一些具有代表性的报刊史料原文,供读者系统地查阅、比对。

以上内容虽不能完整涵盖早期西安电影文化这个庞大的话题,但是通过对早期西安电影放映、迷影盛况、电影与西安的互动、电影人追溯等方面的论述,相信本书可以较为深入地呈现电影初入“长安”时驳杂的景观。

目 录

第一章	于迷茫中摸索：早期西安电影放映	001
第一节	茶园里的新兴娱乐：西安最早的电影放映	002
第二节	渐入寻常百姓家：电影流动放映的尝试	004
第二章	观影空间转向：西安专门影院的建设	008
第一节	固定电影院的建立与变迁	008
第二节	迎商而居：西安电影院的空间分布特点	020
第三节	“东”学“西”用：影院的经营与管理	029
第四节	出类拔萃：阿房宫大戏院的发展	039
第三章	复杂场域：西安的电影消费文化	054
第一节	异彩纷呈：报纸中的电影广告	054
第二节	多元发声：电影评论及其传播	060
第三节	带来现代之光：电影消费的影响	072

第四节	民族大义：抗战时期的陕西电影事业	075
第四章	摩登之隙：西安早期影迷文化的生成	090
第一节	狂热“长安客”：影迷之初现	090
第二节	模仿与拼贴：明星风尚与影迷消费	098
第三节	观念之辩：传统与现代	107
第四节	制度规约：早期西安的电影审查	113
第五章	领风气之先：民国时期重要的西安电影人	117
第一节	业界翘楚：周伯勋与阿房宫大戏院	117
第二节	心系家国：于孝先与民光大戏院	125
第三节	共建西安电影事业：其他电影工作者	126
结语		130
附录		133
参考文献		165
后记		172

第一章 于迷茫中摸索： 早期西安电影放映

“晚上，阿房宫电影院门口，电灯闪耀着奇幻的色影，一对年轻男女歪着脑袋挽着手走来，猛地一抬头男的就：‘是陈燕燕演的《寒江落雁》呢！’‘怪酸苦有味的影片呵！’女的脸上挂着微笑，那么轻轻的答着。”^①(图 1-1)

电影在诞生后不久便传入中国，并且以上海为大本营生根发芽，成为上海都市现代化进程的重要推手。同时，繁复多元的电影文化也成为组构上海都市文化的重要部分。同上海较早地与电影联姻不同，电影与西安的初次邂逅要晚很多。西安深处内陆，在经济发展、社会文化以及交通等方面，与上海、天津等地相比有着较大的差距，这也直接导致电影这一现代事物进入西安相对滞后。但是，在经历了零散且不成规模的放映之后，电影在 20 世纪 30 年代的西安也开始逐渐显露出其魅力，深入西



图 1-1 《寒江落雁》广告^②

① 金芸：《西安街景》，载于茅盾主编：《中国的一日》，生活书店 1936 年版，第十二编第 12—23 页。

② 图片来自阿房宫大戏院广告，参见《西北文化日报》1936 年 5 月 23 日。

安市民的日常生活。

第一节 茶园里的新兴娱乐：西安最早的电影放映

作为西北重要的内陆城市，由于西安地理、经济等条件限制，电影直至1910年才传入，“此时西安的电影放映仍然是以新奇为主，并没有正规的电影放映场所，而是借助于茶园等传统演出空间”^①。目前，有关西安最早电影放映的记载始于1910年9月11日。鸿升茶园在当时畅销的《兴平报》上刊登了一则电影广告：

新制活动写真电影开演：本园为输入文明起见，特从沪上购活动写真电影，凡天文、兴地、人体、生物以及各国名胜、美术、日俄战争等类，其样数甚多，不能备载，最足增长知识而动人观。凡我各界无不相宜，诚文明引线之一大端也。择定本月11、12、13日晚于南关外观音堂演。每晚七点钟演，天明为止。并有新聘到头等名角及请客串，准演新剧外带火彩。请预先持资购取本园凭观票纸，以便接待，特此声明。本园主人启。^②

这则广告是目前有据可查的西安地区第一次出现与电影放映直接相关的广告。从广告的文字内容来看，起码可以说明以下几个有关西安早期电影事业的情况。

① 原文泰、孙晓京：《西安地区早期电影院的空间分布及原因探析》，《电影新作》2017年第6期，第26页。

② 参见《兴平报》1910年9月12日。

首先,相比于上海等其他城市,西安的首次电影放映活动相对较晚。“电影初到上海的时间为1897年5月间,首演地点为礼查饭店”^①,这是可追溯的最早的上海电影放映活动的信息,而西安则晚至1910年,与现代娱乐方式的结缘二者有较大的时间差距。其次,与多数城市初次放映电影的状况相仿,这时的西安还没有正规的电影放映场所,只是借助茶园等传统的演出空间。同样,从广告中可以看到,电影放映并不是当天晚上的唯一活动,重头戏还有“头等名角”等人的“火彩”表演,新奇的电影被当作这类娱乐场所现代化演进过程中招徕顾客的重要方式之一。显然,电影放映与传统戏剧演出的共同出现,也是电影初入西安时,考虑到本地居民对西洋玩意的接受程度,在地化适应的一种尝试。

经历了初次电影放映之后,西安的电影事业开始了艰难且缓慢的发展,首先表现在这一时期西安电影放映的片源相当有限。由于远离当时中国电影的生产制作中心上海,而且与沿海地区的交通也不便利,因此西安能够放映的电影相对陈旧且样式单一。更为关键的是,西安尚未建立起从沿海地区引进电影的稳定渠道。这一时期,陕西电影放映活动的片源主要有三个来源。“一是从天津、北京、山西等地来的私人电影放映商流动放映到陕北。”^②据载,1921年,曾有从外省来的电影人,在米脂县城内东街冯元埔院内售票放映无声电影,票价20文铜钱。“二是1912年后,驻陕军队的一些单位来放映电影。”^③1922年,陕南驻军在南镇县(汉中市)汉台南边驻地(今中共汉中市委地址),用小型手摇放映机放映美国纪录片《跑码厅》和苏联纪录电影《集体农庄》等;1927年,国民党第一督军在

① 黄德泉:《电影初到上海考》,《电影艺术》2007年第3期,第109页。

② 刘小磊:《从传入途径与方式看中国电影早期发展格局》,《电影艺术》2007年第2期,第75页。

③ 同上。